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经济学家为什么关心道德——中国经济学(家) 的道德追问[why do economists concern about morality-- Chinese economists' moral]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朱, 金瑞
Publisher	河南财经学院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30 11:10:1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566

朱金瑞：经济学家为什么关心道德 中国经 济学(家)的道德追问

朱金瑞

道德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包括厉以宁、茅于軾、樊刚、刘伟、张曙光、汪丁丁、盛洪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或著作，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并希望有此来解决中国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经济学家的道德追问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共同关注道德问题？他们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足？对这个问题的梳理，是中国经济学、伦理学乃至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进一步发展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时有涉及，但中国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则是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视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最终掀起了争论的高潮。

经济学家对道德的追问，是围绕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一中心主题展开的。其高潮是1998年在《读书》杂志上开展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

何清涟是国内较早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1996至1998年，她在连续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中，提出国内经济学家普遍缺乏对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并且提到樊纲的观点——经济学不讲道德。作为回应，樊纲在1998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同年7月，《读书》杂志又发表了经济学博士盛洪的《道德、功利及其他》。接着，《读书》在当年的第1期又发表了姚新勇的《不道德的经济学道德误区》。

一方认为，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经济学家谈道德是“不务正业”。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为代表。

其理由是：经济学的本质是对事物进行效率判断，而不是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这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本质区别。经济学没有责任去研究各种道德观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尽管经济学能把一种经济制度的运行如何影响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揭示出来，但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个经济过程的“副产品”来看待。经济学的主旨应当在于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比如说，经济学对假冒伪劣这件事所能做的是开出“政策药方”，而不是靠“宣传教育”，靠“打动”或“唤起”人们的良心或良知去消灭假冒伪劣，通过改变人性去改变社会。同时，从本质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是中性的，他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其“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其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

另一方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必须讲道德。以茅于軾、张曙光、刘伟、何清涟等为代表。

其理由是：首先，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历史上由来已久。亚当·斯密有与《国富论》齐名的《道德情操论》。获得诺贝尔奖的现代经济学家，如哈耶克、阿罗、弗里德曼、布坎南、诺思、西蒙等，都发表过对道德问题的看法，诺思曾经把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1981），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在“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1987）。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及两者的分离而导致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

其次，分工立场的灵魂是“效率”，而效率正是一切经济领域活动中首先要遵守的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观点的根据在社会分工，即不去讨论“行外”的事。事实上，分工的灵魂是“效率”，凡是达到效率标准的就是“好”，否则就是“坏”。不仅如此，效率的实现，在需要一定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一定的技术条件及一定的社会基础设施等做为物质基础的同时，还需要道德基础。这是因为，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由人来使用，技术条件的发挥同人的素质有关，也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有关。

再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道德作为一种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调节力量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要靠法律，也要道德，这是两个基本机制。事实上，与法律相比，道德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这是因为，一是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的漫长的岁月里，在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时，道德调节是惟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即便在当代同外界接触较少的部落或边远地区仍然如此；二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留下的空白也只有靠道德与习惯调节来弥补；三是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交易和非交易两大领域。在交易活动中，市场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政府起着高层次的调节作用。但在非交易活动中，因其不受市场规则的制约，政府也不能进入其中进行直接干预，那么就只有靠道德力量了；四是由于种种原因，市场可能失灵，政府可能瘫痪，这样两者都有可能不发生作用或发挥十分有限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习惯调节却依然存在。因此，如果说市场调节是“无形之手”，政府调节是“有形之手”的话，那么，习惯与道德调节却是介于“无形”与“有形”之间的，是“道是无形却有形”。

第四，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而经济学家则不可能是“道德中性”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着脱离道德和伦理的“正业”，在道德与伦理面前，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自己置于“业余”的位置。真正的职业领域都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现存社会道德传统中，同时又通过个人对职业的操守去体现道德的原则。因此，经济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理解为“道德中性”（实际上远非如此），但作为经济学家来说，职业道德必须服从社会道德的约束。

随着经济学家要不断不讲道德的争论，中国经济学界相继出版了茅于軾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厉以宁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何清涟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刘伟、梁钧平的《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等著作。其中，茅于軾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著作颇为畅销。

之后，经济学家对道德的关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除先前的厉以宁、茅于軾、张曙光等经济学家以外，张卓元、林毅夫、董辅、胡鞍钢、汪丁丁、陈彩虹等著名经济学家纷纷上阵。经济学研究的新秀们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韦森、赵晓等；二是经济学家对道德的关心更多地转入现实经济道德构建方面的思考。经济学要不要道德已经不再是这个阶段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经济道德的经济制度规定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经济道德问题，犹如经济学研究成本—收益一样重要和文学研究爱情主题一样长久。因此，经济学家的道德兴奋点，相对集中在对现实经济道德的分析上。尤其是针对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表现等问题，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无价亦有价》、《治理信用“污染”有可良策》等，虽然不同人对失信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也不尽一致，但对诚信问题的关注却是相同的；三是“不讲道德”派经济学家的态度有所变化。面对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现实，曾经主张不讲道德的学者们对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了动摇。如樊纲在《走进风险的世界》（1999年）一书中，坦言自己“经济学家不应该谈道德”在用字造句上不够严谨，引起了误解，并修正了自己的“说法”：“经济学不是不

应谈道德，而是不应做道德说教。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是实证地分析制度：我们经济学家要更多地分析制度如何使道德沦丧，而不是指望靠道德说教去改变人们的行为，偏偏忽视了制度（法！）的改进。

二、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关注道德？

中国经济学家对道德的关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但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发展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道德追问或者说是针锋相对的争论。如果说前期的道德关怀主要基于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本性使然，那么20世纪末的那场关于道德的争论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变革中，对市场化道路反思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经济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自己学科边界、方法、作用等深刻反思的结果。正如姚新勇先生所分析的：道德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在目前阶段，道德问题已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学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走向道德关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是非反思是引起道德追问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五大前后，一方面，中国改革围绕姓社姓资的争论十分尖锐，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当激进的办法，在产权交易的名义之下，企业未经公共选择程序就转到个人手中。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愈演愈烈。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许多问题日益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现象日益突出，对人民生活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包括研究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在以法治国的道路上刚刚迈步。体制的不健全，法制的完备，使经济学家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转而向道德寻找帮助。从中国当今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告别了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构，要做到这一点，或者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整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者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

2 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产物。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大变革，尤其是作为一个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市场经济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产生于西方土壤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相反，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却是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所推崇的，导致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正如何清涟分析的：中国经济学由于只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生吞活剥地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结果弄出了一堆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一堆糊弄人的伪理论，经济理论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围绕关于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而这些所谓的“不讲道德”的批评，可能并不是指责他们不在经济学论著里谈论伦理学问题（至少我所阅读的何清涟和卞悟的一些文章就不是如此），而可能重在批评他们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脱离对具体的改革实践、问题、矛盾的分析，以学术纯粹性、客观性的外表，掩盖其理论和道德的双重矫情。这样说来，我们所谈的就不应该是经济学与道德和伦理学有无关系的问题，而应是避开了改革矛盾和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是否道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敢直接面对的话真不敢想象他们的研究能够言说真问题。因此，结合中国改革中在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失业与通货膨胀、个人消费、个人投资、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等方面都面临着两难选择，研究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实质上就是对一系列两难选择作出估价，作出判断。

应该说来，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经济学家的功不可没。没有市场经济也许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同样，没有千千万万个吴市场、厉股份们的振臂高呼，也许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过，区别和分清经济学家的流派和主张就象数自己的头发有多少

根一样不可能。我们无意去分析各派经济学家的专业主张，但可以看出，关怀道德的经济学家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铁肩担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这种精神有源自学术良心和追求，也有源自对社会的责任。二是他们既反对把西方某个经济学流派当作灵妙药，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至少有的经济学家的主观动机如此。正如王梦奎先生指出的，在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有待研究。经济学作为经世济世之学，需要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捕捉研究课题，而不能单从书本讨生活，因此经济学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即要唯实，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利，不唯情。三是他们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许多相关的因素在起着作用，纯粹就经济论经济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教授就提出了“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并对建立信用机制从法律、道德、文化等层面作了系统的分析。

3 对经济学界限的思考和经济学最大化假设的困惑。对有着耻于言利价值传统的中国来说，经济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使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展为显学。在这种背景下，现代经济学帝国主义横刀立马、当仁不让地对其它学科领域进行了大举的入侵。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经济学的使命，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但问题的关键是，正是经济学的这种霸权使经济学家感到深刻危机：

一方面，当他们真正地进入非经济学领域之后，就发现了一个突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即经济学的界限问题，也即经济学的学科标准、学科范围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童年时期，这是一个必须面对而又引人入胜的问题。

另一方面，最大化作为经济理论的终极假设和前提，尽管可以获得经济统计学意义上的某种支持，但要获得经济理论和社会全体的系统说明与接受则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根本就在于，经济人最大化的假设只是对所分析的主体做出的价值假定，谁是谁非将是有待历史来证明的。

第三，经济学家的人生体验却一次次地告诫他们，离开了物质利益的尘世俗土，最大化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他们为经济学的生命力担忧。在一种学科仅仅交给一个简单的理论假设，并以此为绝对信仰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这种学科的生命力也就在这样的扩展中日渐式微了。于是，一个真正理解经济学并热爱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会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一种圈外人无法体会的铭心刻骨的痛苦和矛盾。正如非常关心经济学中的道德问题的叶航教授，在此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后指出：他们时时承受着难以割舍的煎熬，要么承认最大化本身就不是最大化的，但这意味着对经济学的某种背叛；要么坚持最大化的最大化努力，但这意味着对良知的某种背叛。因此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它是人类作为道德人和经济人的亘古矛盾在经济学家身上的聚焦和映射。当经济学家打开最大化潘朵拉之盒那天起，他们就注定了要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忍受天帝的惩罚。越是深刻的经济学家，其感受到的肉体与灵魂、理性与良知、思维与人格的巨大搏击也越深刻。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上事实。

因此，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的边界，致力于经济学的独立人格、新的学科标准的建立和范围的划定。否则，经济学的视界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学本身也就面临着危机。

4 出于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经济学是人文科学，而非自然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多数主要流派，无不把对人的研究摆在研究的重要位置。事实也是如此，在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层次上，如经济运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问题上，无法回避人的问题，也不能不涉及伦理判断和伦理原则。厉以宁先生更是直接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体制、目标和人。他指出，无论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把对人的关心置于首位。只有这样，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最终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系列基本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最终解决。正如《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厉以宁》的作者陆昊所分析的，厉以宁之所以晚年重视并对经济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主要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并始终把对人的研

究理解为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第16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厉以宁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了人性、伦理、习俗、道德等以人为本的问题之上。叶航教授通过对盛洪道德功利说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料定，生活中的盛洪一定充满了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如此，他的道德功利说与其是写给世人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

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

对道德进行典型的经济学分析是时下经济学家关心道德问题的特点之一。如他们虽然强调道德调节在经济发展中是超越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和经济规律等对道德的影响。如盛洪先生提出，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11）汪丁丁则说我所理解的道德，其核心部分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合作的知识。而人与人的合作，正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12）。

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大多只是偶尔为之，学理的深入探讨不多，这也是当今经济学界道德追问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都有涉及，但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有人坚守阵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和其它学科就道德问题没有形成碰撞和交流。现在有一个新的学科——经济伦理学，就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坚守经济伦理学这个学科，并在这个学科辛勤耕耘的多是伦理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没有进行理论的建构，经济学家和伦理很难对话。在经济伦理学这个学科，经济学家应该大有所为。

用经济学的视角关注道德问题，不仅有助于拓展经济学的视野，而且对克服哲学伦理学视野中对经济运行中伦理问题认识的局限也大有裨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会越来越多地凸现出来，这就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有机溶合成为可能，也为一门新兴学科——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用经济学与伦理学交叉的视角研究经济伦理问题，这是经济学研究道德问题的最佳形式，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关注道德问题和伦理学界关注经济道德问题的薄弱环节。应该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经济学家如何研究道德最重要的切入点，也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共同建构经济伦理学使之成为一门交叉性学科的关键。

注释：

刘伟、梁钧平著：《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第9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樊纲著：《走进风险的世界》，第50页，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姚新勇著：《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第1期

赵晓著：《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见《博士咖啡》网

何清涟著：《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第1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转引自张剑荆等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樊纲》，第12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厉以宁著：《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结束语第25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陈彩虹著：《经济学的视界》，《自序》，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叶航著：《谈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道德研究》（一），见《叶航在线》网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3月12日第4版

(11)《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3月12日第4版。

(12) 叶航著：《汪丁丁与道德博弈说》，《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3月19日

（原载《经济经纬》2003年第3期）

/